

岁月留痕

几个苦涩的小数字

刘玉堂

前不久至潍坊,想起了我的一个老乡战友说起的一件往事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所在的基地欲在山东设一个测量团,我这个战友是参与勘查选址的。他们几个人开着两辆北京吉普,风餐露宿,沿渤海湾一路勘察,来到了潍坊境内。途中歇息的时候,遇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,扛着一个大南瓜,神情落寞又十分疲惫地走着。那男孩一见到他们,突然有点兴奋,遂问道,解放军叔叔,今晚放电掮儿(影)吧?那几个人愣了一下,待反应过来即哈哈地笑了,问他,你怎么会认为我们是放电影的?那男孩说,我们这里整年看不上一回电掮儿,也就是解放军叔叔来野营拉练的时候给放一场,看你们拉着机器——是发电机吧?以为你们放电掮儿来着!那几个人告诉他,我们不放电影,这个发电机是我们露营的时候用的。之后,问他扛着这么大的南瓜干吗去?那男孩告诉他们,是赶集去来着,串了八里地,没卖了,又扛回来了!那几个人里面有一位外省籍的炊事员,是专门给他们做饭的,遂问他,你准备卖多少钱?那男孩说,卖个能买本子的钱就行了,一毛二!那炊事员竟跟那男孩讨价还价,说是八分钱行吧?那男孩犹豫了一会儿,说行吧,再扛回家卖不了,更不值钱了!遂成交。

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,我那个老乡战友并没有亲眼所见,他当时在一棵大树底下,正跟其他几个参谋绘制军用地图,欲标出

所在的位置,离那个讨价还价的现场有一段距离。待他们绘制完了,那小男孩也走远了,我老乡战友方知此事。那炊事员是想着我战友面前卖乖,显摆如何占了个大便宜的,不想被我战友一拳给打倒了:你他妈的太欺负我们山东人了,你就缺那四分钱,让那孩子买不起个本子?之后立即让司机开着吉普追那男孩去了!最后是追到男孩所在的村里,好不容易找到那孩子,给了他四毛钱。

我老乡战友选址回来,给我说这件事,说着说着还掉了眼泪,说咱老家还很苦呀,没想到这么苦……

依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至广州出差,住在位于珠江边上的南海舰队招待所。这天傍晚,我至珠江边散步,在一座桥头上,遇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,蹲在那里卖香蕉。那是个典型的广东女人的形象,肤色黝黑,个子瘦小,赤着脚,旁边是两大嘟噜新鲜的香蕉,用一根竹子扁担插着,一看就是刚砍下来的。说起话来,我知这妇女是广州郊区的,来此要步行三十多华里,香蕉是一毛一斤。她说,这香蕉在当地买,八九分钱即可买到,挑到这里,若是卖好了,每斤能赚二毛钱。我试着提了一下那根两头都插在香蕉嘟噜里的扁担,应该有五六十斤不止。也正因为那香蕉是刚砍下来的,还不熟,不能马上吃,故而我在旁边瞅了半个小时,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。我因为

还要转几个城市,不能马上带回家,要尝,还不能马上吃,也就一斤没买。晚上十点多了,我从招待所五楼的窗口,看见那女人还蜷曲在两嘟噜香蕉中间,身影黝黑而瘦小,看上去比其中的一嘟噜香蕉还小似的。待我睡了一觉起来,再从窗口看出去,那女人不见了。那么她是又将那两大嘟噜比她的身形还要大的香蕉挑回去了吗?一种同病相怜般的情感在心中纠结,之后再也没睡着,一晚上就在那里寻思:五六十斤香蕉,一斤也没卖了,连口水也没喝,又是赤着脚,黑灯瞎火的,三十多里地,怎么走呢……

下边的故事,是听著名作家王愿坚老师在一次笔会上讲的。他说一个人坐长途汽车,可能会打瞌睡,也可能看本书,可你见过有人拿着账本当书看的吗?我就见到过。一次出差,他见一个人在车上拿着一本账簿老在那里翻,且嘴里念念有词,有时还唉声叹气,遂问他,一个账簿有什

么可看的,你怎么会这么专心致志?那人就说,自己是大队的会计,一个数字就是一个故事啊,我能将这本账上的所有数字都背过!王愿坚老师即接过账本,随意点了几个人的名字,那会计即将每家几口人,去年挣了多少工,分了多少粮,又得了几块钱,背得分文不差。之后他说,我不是特意要背过的,而是这些数字太小,太可怜,也太好背了,一个工二毛七,你挣得再多,还不是一口就能说出来!

——全是些可伶又苦涩的小数字!为什么要说这些事?一是这里面的有些道具连同它们的故事,可能再也不会出现或发生了,比方说,一分钱是怎么个概念?你问90后的孩子,他就未必能知道。二是可以温故而知新,让你时时不忘自己的身份,知道自己能扒几碗干饭,还会让你五味杂陈,忆起过去的钱可真值钱等等这些往事与故事……

旅游笔记

你好,伏尔加河

京京

光阴荏苒,日月如梭。如果你的青春岁月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度过的,你一定会记得很多苏两国人民友好的那些火红的日子。无论你是工人、农民、科技工作者还是教师,但凡和外国同行打交道,其中绝大部分肯定是我们“苏联老大哥”。哪怕你只是一个中学生,突然有一天你们班级会接到来自俄罗斯一所中学的来信和相册,你们之间的友谊就此开始,许多感人的故事就此发生。此后,尽管中、俄两国各自经历过很多变化,但是,置于普通百姓心中的友谊基石却没有动摇过。难怪“徜徉伏尔加河”旅游项目一经推出就在社会上产生了热烈反响。

许许多多上世纪60年代赴俄罗斯留学的老海归们来了,他们之中有许多是知名的学者、教授。中国社科院的贾泽林教授这样说:“人都有梦。万千旅游者出游,有的是为了‘寻梦’,有的是为了‘重温’旧梦——追寻和重温53年前留下的那个温馨而美丽的梦。”许许多多著名艺术家来了,他们之中有著名歌唱家李光曦、朱明瑛、胡松华、刘秉义,著名话剧艺术家张家声,等等。而更多的则是唱了一辈子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和《伏尔加河船夫曲》的普通百姓。他们说,就是要在莫斯科再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要在伏尔加河上高歌《伏尔加河船夫曲》。

新的国际环境和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中俄友好新的内容。在两国政府的领导下,中俄友好正在谱写新篇章。伏尔加河项目一开始就受到两国有关政府部门的热情肯定和指导。每年的开船仪式,俄罗斯旅游署、中国国家旅游局驻莫斯科办事处也都派代表出席并讲话。每次行程结束后,都有不少人写信、写诗、写书法,表达他们对伏尔加河之旅的感受。有一位老专家来到圣彼得堡后,专程去他留学时常去的公园,坐在他曾经常坐的那张长椅上……岁月沧桑,抚今忆昔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啊!因此,每年年初的团友联欢会,就是一场追忆中俄友谊的聚会,大家祝愿中俄友好就像伏尔加河和长江那样源远流长!

当然,伏尔加河之旅,并不局限于上述种种活动和友谊的交流。须知,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,有着极丰富的自然资源。森林、湖泊、河流、草地、山峦宁静而博大,出没其间的小鹿、松鼠一起构成一幅幅大自然和谐而美丽的画面。同时,俄罗斯又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国家,在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戏剧、电影等诸多方面产生了诸如普希金、果戈里、托尔斯泰、高尔基、柴可夫斯基这样影响世界的文化巨匠,在俄罗斯的每一天你肯定会因此而产生很多遐想,给你的旅游生活平添无数值得纪念的瞬间。俄罗斯两个最重要的大都市——莫斯科和圣彼得堡,是必不可少游览地,莫斯科红场、冬宫、涅瓦河等等都是最令人向往的人文胜景。在传统的俄罗斯小镇停泊,和俄罗斯百姓及他们的传统文化进行零距离接触,了解和体验当地的民间风情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收获。

人生边上

陪老妈手术

简默

老妈身患腰椎管狭窄,到了非手术不可的地步。我陪她去北京做手术。

住进医院,接踵而至的是一张张检查单,循着它们指引的方向,我陪老妈乘着电梯下下上上,满院子寻找着做各种检查。

待到检查做得差不多了,终于排到了做手术。

头一天,主治医师、护士们围绕着老妈,开始忙碌了,询问病史,交代相关事项,上各种术后设备,灌肠、备皮等等。这让住进来不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,就是到处奔波着做检查,既不吃药又不输液的老妈猝然变得不适应。尽管她此刻享受的是女王的礼遇,有那么多人,一趟趟地来到她床前,有时仅为帮她收拾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细节,像走马灯一样。但我能够看得出来,老妈就像是拔河,在一连九天无聊和忙碌交织的等待中,一下子被扯到了手术台前,她紧张、恐惧、无奈、顾虑重重……

当天下午,麻醉科医生找我,要我签字。

接着是主治医师。这次是老妈和我一起听。在这间唤做“阳光室”的办公室里,中央一溜儿桌子,墙角倚着一具人体模型,斜斜的夕阳轻易地忽略了它。室内还有另一拨医生和他的病人,与我们隔着桌子,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。我们的医生照着面前的一张纸,逐条地对着我们说,对面的医生也照着面前的一张纸,逐条地对着他的病人说。如果说俩医生的声音一个是东风,另一个是西风,那么,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,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。他俩已经习惯了这样,面对着自己的听众,一板一眼地叙述,互不尴尬和排斥。倒是对面的声音不时浩浩荡荡地涌来,淹

没了我们的声音,霸道地抢占了我们的耳鼓。我看不清我们的声音在表达着什么,只看到一张嘴巴在不停地动。听不清没关系,白纸黑字在桌上摊开着,医生已经将手术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,尽可能地条分缕析了出来。面目冷酷地刺激着我的神经,甚至连ICU(重症加强护理病房)都替我们考虑到了。我只要带一对耳朵,用来倾听;带一只手,用来签字,就足够了,其他都是多余的。

最后是骨科主任。整合手术中,他是唯一手捏柳叶刀的人。经过朋友的介绍,这几天我跟他有过接触,总体感觉他说话简洁、干脆、犀利,就像那把柳叶刀,在窄小的体内蕴藏着汹涌的锋芒。这是傍晚六点半分的北京,在他的办公室里,我与他相对而坐,隔着一张桌子。他指着老妈的磁共振片子,随手摸起案头的一段骨头模型,向我解释着手术的方案与意义。我清晰地看到,片子上个别部位被阴影覆盖了,就像凭空飘来了一朵乌云,遮住了原本明亮澄澈的天空。他和助手们所要做的,正是拨开这些乌云,将明亮澄澈重新还给老妈。

一夜无事。老妈睡得还可以。她早早地换上病号服,等待着医生推她去手术室。我鼓励她别紧张,要相信主任的技术。她似乎为了宽慰我,笑笑,说我不紧张。

八点零八分,俩医生来推老妈去手术室了,我被要求在病房等候。

挨到下午一点三十分,护士站通知我去看标本。我站到那道神秘的门前,看到了塑料袋中模糊的赘生血肉。主任站在门里,介绍了手术的过程,那把柳

叶刀重新绽放了简洁的锋芒。

时间继续迈步向前。我的心重新被提了起来,担心着会不会有何反复,又想到了那个最后的ICU。一直到下午三点五十三分,老妈重新被推回了病房。

老妈全身麻醉的药劲尚未散尽,正处于神志不清醒中。医生叮嘱我在未来的三个小时内,要不停地唤着老妈,别叫她睡着了。

我不断地唤着老妈,要她醒醒,别睡着了,甚至卑鄙地以走开相威胁。侧躺的老妈眼皮睁开,仿佛两个沉重的石磨,随时想着合上,昏昏睡着。看到老妈这样,我唤着她,要她看着我。她的眼睛睁开,我用手帮她撑开眼皮,光亮一刹那透了进去,她看到了我,兴奋地叫着我的名字。随即又合上了,我在她耳边大声地喊,我走了啊。老妈努力睁开眼,仿佛一个溺水的人,喊着叫我别走,又从被窝里伸出手来,握握手。我抓住了老妈的手,她满足地说,是儿子,真是儿子的手。如此反复,我无数次地将老妈唤醒,无数次地打断老妈的睡梦。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样

有些残忍,内心与肉体挣扎了八个小时的老妈,多么渴望好好地睡一觉啊,但是不能啊!

老妈似睡非睡,一直被我大声唤着,她也断断续续地说话,说她远在贵州的姊妹,说我们这些儿女,说她的那些老同事……此刻的她并不完全清醒,但所说的每一句话,都有现实的内在逻辑,有她自己的是非评判标准。邻床那个置换膝关节的阿姨听了悄悄地对我说,你母亲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!

老妈也在不断地喊渴。但医生交代过,她暂不能喝水。我用棉签蘸了矿泉水,擦她泛紫而干涸的嘴唇。有时蘸得多了,滴入了口中。她闭着眼睛,吧嗒着嘴,陶醉地说,真甜,真好喝。我猛地想到了老妈喂大我的乳汁,眼睛湿润了。

上半夜在喋喋不休中过去了。至下半夜,病房内外寂静无声,老妈渐渐地睡了。

第二天,闷热多天的天气倏地凉爽了下来,日子在风和日丽中被拨亮了。

第三天,老妈已经能够下地。



编辑:孔昕

邮箱:kongxin305@163.com